

“利玛窦规矩”

□ 黄淮学院 朱大锋

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



原本)、《乾坤体义》、《坤舆万国全图》等深受中国人喜爱,甚至连利玛窦本人也被中国官员和文人当作“世界上最伟大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后,随着其海外殖民事业的拓展,西方天主教会输出宗教的热忱空前高涨。为了扩张势力,天主教建立了传教组织“耶稣会”,转向东方发展。由于利玛窦之前来华的耶稣会士与澳门殖民者保持密切关系,明初政府实施了闭关海禁的对外政策,加上驻澳门耶稣会士实行的完全“葡化”的传教方式过于陈旧、僵化,不少传教士便认为“让中国人改变信仰”会如同“接近月球”一样困难。^[1]在此背景下,天主教会中范礼安等提出了针对中、日等东方国家的“文化适应政策”。稍后,罗明坚、利玛窦等受命来华传教。利玛窦等所采用的天主教儒学化传教方式,被康熙皇帝命名为“利玛窦规矩”,其主要内容如下:

1. 为了减少传教阻力,在传教过程中通过交结和皈依上层官员、文人学士,奉行上层路线,达到在华传教的最终目的。利玛窦多次讲道:“假如有一批知识分子或进士、举人、秀才以及官吏等进教,自然可以铲除一般人可能对我们的误会。如果士大夫相信我们,而其他的人也就更容易皈依了。……一位知识分子的皈依较一般教友更有价值,影响力也大,我设法使知

识分子皈依成为教友,对象不是大批民众。”^[2]为了方便与中国的官员和士大夫的交往,赢得其信任,从1594年起,利玛窦不仅开始蓄发留须,还由身着僧装改为身穿儒服。他非但接受了中国式礼节、生活方式,而且放弃了部分西式生活方式。他说:“每天只吃大米,而无面包与葡萄酒,为此我并不十分痛苦,由于已习惯了这种生活多年,如让我更改此习,我还会感觉有些不便呢。”^[3]在传教过程中,利玛窦结交了不少名士与权贵。在南京居住期间,利玛窦通过瞿太素的帮助,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杨庭钰及思想家李贽、徐光启等受利玛窦等人的影响成为护教论者,有的甚至接受洗礼成为教徒。

2. 在传教过程中利用西方的科技知识引起中国人对于天主教的注意。利玛窦在中国传教过程中很快发现,中国人对“实学”比对天主教更有兴趣。为了引起更多中国人对天主教的注意,他首先向中国人介绍了天文、地理、数学、物理等方面的知识。他随身所带来的三棱镜、自鸣钟、地球仪、世界地图等物品以及他所讲的数学、天文学等知识深深吸引了中国官员和文人。传教士们所翻译的西学书籍,如《几何

的数学家》加以追捧。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就是在阅读利玛窦编译的书籍之后开始倾慕西方科学,而后又成为天主教信徒的。

3. 为了规避天主教与儒家文化的冲突,传教士们极力将儒学与天主教撮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并实行了“补儒”、“合儒”想法。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首先必须面对当时中国的主流儒学文化,对它的态度和看法如何成为能否在华真正进行传教的关键。为此,利玛窦等传教士努力精通中文,刻苦钻研儒学。当双方不可避免地出现冲突时,他们并没有针锋相对或恪守成规,而是不惜把天主教教义稍微做了些调整和变通,试图最大限度地把天主教和儒家文化会通糅合,使之成为适合中国儒学文化的宗教。比如,利玛窦在其《天主实义》、《二十五言》、《交友论》等著作中,不仅着重从孔孟儒学经典中寻求与基督教教义相似或相通之处,而且利用孔孟儒学思想论证、附会、诠释天主教教义,大胆地用上古典籍中的“上帝”、“天”来对应基督教教义中的“神”和“天主”。

4. 对中国传统的习俗保持宽容的态度,甚至允许中国天主教徒继续传统的祭

袁大为赏识,于5月底特赐杨度亲笔题写的“旷代逸才”的四字匾额一方。在组建“筹安会”的时候,杨度还多次策动蔡锷参加。

杨度之外的十三太保当中,另一重要人物是交通系魁首、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起初,梁并不热心帝制,后在袁克定的逼迫之下,表示要全力以赴,用钱包在自己身上,并提供了推动帝制的路线图。

除了十三太保之外,还有一些人对帝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陈宦:1915年11月,陈宦受命为四川都督,临行前,伏地九叩首,并跪着上前,嗅袁世凯的脚,大呼:大总统如明年还不登基,我陈宦此去到死都不回来了。陈宦

这些北洋将领,想的就是:大哥做了皇帝,小弟也争个将军到手。

阎锡山:阎锡山尽管是同盟会员,可在帝制期间为保全自己的地位,极力推动,还把自己的父亲阎书堂送到北京租屋居住,表面上是请老人家逛逛北京,实际上是把父亲作为人质,使袁对他放心。

张作霖:他曾对袁世凯发誓道:关外有异样,惟作霖一人是问,作霖一身当之。关内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本部以平内乱。

古德诺:1915年7月,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古德诺博士访华,并于8月20号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认为中国民智低下,只宜行君主立宪而不宜行共和。

日置益:1915年1月18号,日本公使日置益对袁世凯面递《二十一条》时说:“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一步。”

朱尔典:英国公使朱尔典在中南海怀仁堂国宴间,竟用英语尊称袁世凯为“陛下”。

从上可知,袁世凯当上皇帝,既有自己的原因,也有客观的条件,合在一起,成就了袁世凯的83天皇帝梦。这是袁世凯的人生高峰,同时他的事业包括生命也在同一时刻戛然而止。

★作者简介:苏全有,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后

天、祭祖、拜孔等礼仪。与很多传教士的观点相反,利玛窦认为中国人在祭祀祖先时只是表达了后人对于祖宗先辈的敬意,没有宗教的含义,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所以主张允许中国教徒继续保持祖宗的牌位,在牌位前点香行礼。同时,他认为读书人和官员祀孔是中国的传统,这是为了感谢孔子在书中传下来的崇高学说使他们能得到功名利禄,同样不是宗教性的活动,因而他也允许教徒到孔庙参加祭奠活动。

总之,按照“利玛窦规矩”,传教士们一方面以尊重中国本土文化的谦虚态度,借助中国文化固有的阐释结构解释基督教教义,另一方面又从文化外在形式,如服饰、语言的认同和适应,深入到内在哲学思想的调适,从而使天主教得以进入中国社会。

事实上,明末清初的中西方文化交流面临着诸多障碍,中西双方在尚未彼此真正了解的基础上,可谓各怀心计,各有打算。但以“利玛窦规矩”代表的天主教传教策略在客观上却促成了中西方文化的首次大规模交流。据美籍华裔学者钱存训的研究统计,1584至1790年间,利玛窦、金尼阁、艾儒略等来华耶稣会士所译西学书籍约计437部,其中,关于天主教教义类251部;数学、天文、物理机械、医学等科学技术类131部;哲学、教育、地理等人文科学类55部^[1]。

客观地说,欧洲科学从16世纪末起传入中国,这主要不应归功于传教士们的积极性,因为传教士们并不是为了传播欧洲的科学才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而主要取决于当时“理学”衰竭之下,一部分中国人主动地向西学“实学”表现出的好奇与需要。比如,李之藻从青年时代就酷爱地理学,孙元化向徐光启学习数学,徐又向传教士们引荐了特别关心西方火器的孙。王征从其舅父处继承了对机械学的迷恋和天才,当他发现传教士们拥有图解机械学原著时,便被吸引到传教士一方了^[2]。这些经由传教士传入中国的科学知识,有的是该学科中的启蒙或经典之作,这客观上对于丰富中国的科学文化,促进中国近代科学家的成长有一定的作用^[3]。

传教士在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同时,还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如罗明坚翻译了《大学》的部分内容和《孟子》,利玛窦翻译了《四书》,卫方济编译了《中华帝国经典》,殷铎泽翻译了《论语》和《中庸》,殷铎泽与柏应理编译了《中国之哲人孔子》,刘应翻译了《书经》和《礼记》,雷孝思编译了《中国最古之书易经》,宋君荣编译了《法文书经》等^[4]。中国的儒学思想传到欧洲后,被加以重构,成为启蒙思想家的素材直接影响着欧洲的思想界。正如赫德逊所说,因为18世纪欧洲在思想上受到的压力和传统信念的崩溃,使得天主教传教士带回的某些中国思想在欧洲具有的影响,超过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5]。重农学派的代表、有“欧洲孔子”之称的魁奈认为,中国的《论语》是“讨论善政、道德及美事,此集满载原理及德行之言,胜过希腊七圣之语”^[6]。

在自然科学方面,突出地表现在西方传教士对于中药、天文历法、中国建筑的关注。医药学方面,邓玉函研究中国本草80余种,卜弥格的《中医津要》、冯秉正的《中国通史》论述了中医和中药,殷弘绪向欧洲介绍了中国医药和保健技巧,韩国英的《北京教士报告》论述了中国医治天花的病理。天文学方面,李明的《中国现状新记》和宋君荣的《中国天文史略》介绍了中国人对星象、日食的观察记录和干支计年法。建筑学方面,兼乾隆宫廷画师的王志诚向欧洲详细介绍了中国园林的特点。后来伦敦、波茨坦、慕尼黑、凡尔赛等地的建筑都反映了中国建筑艺术的风格。此外,传教士还从经济、军事、地理、社会风俗上向欧洲介绍了中国。同一时期,汉学研究和教学机构在西方大学纷纷建立。中国科技的西传启发了近代的欧洲科学家,他们开始将中国科技纳入他们的研究视野。据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研究过程中就曾广泛涉猎中国科技资料。总之,中国科技对于欧洲的影响正如李约瑟所说:“世界受惠于东亚,特别受惠于中国的整个情况已经非常清楚的显现出来。”^[7]

明末清初“利玛窦规矩”所表征的文化适应策略,对于今天不同文化间乃至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对话具有普遍借鉴意义。

第一,相互尊重是不同文化间交流与

对话的必要前提。在不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克服自然的屏障和隔阂,而且需要超越思想的障碍和束缚,更需要克服心态上的偏见和傲慢。交流双方都应本着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态度对待彼此的文化。尽管利玛窦等人在中国传教的过程并不是与中国人处于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地位^[8],但他们在传教过程中对中国文化传统所持的尊重态度确实是促进双方文化沟通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增进彼此了解是不同文化交流的重要条件。明末清初,天主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到传播,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中西双方通过彼此学习、了解,认识到天主教和儒学至少在宗教道德方面有诸多相通之处。比如,天主教与儒学在信仰观、人性论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但两种学说都相信一神论,都主张“仁爱”,都重视精神道德修养问题。而这一认识结果是双方对彼此的文化作了一定程度的认真沟通和了解之后得到的^[9]。

第三,面对彼此间的差异,双方要以“和而不同”来代替文化对抗。明末清初中西双方企图存天主教神学与儒学之“异”而求其“同”的做法,虽然不是出于高度的理论自觉,但在欧洲推行殖民扩张的时代,其实质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相一致的,这无疑在当代表着一种历史进步。再加上明代的社会上层人士以至清代的康熙皇帝等对西方传来的天主教,特别是传教士所介绍的科学文化采取的补我所短、为我所用的包容态度,为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营造了较为和煦的环境^[10]。

参考文献:

- [1]邓恩.利玛窦到汤若望[M].余三乐,石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2]罗鱼泽.利玛窦书信集[M].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
- [3]潜存训.近世译书与中国现代化[M].文献出版社,1986.
- [4]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M].耿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5]罗大正.传教士东来与西学传播[J].齐鲁学刊,2004,(6).
- [6]吴光会.唐棣宣.明清时期耶稣会传教士与“中西西渐”[J].宜宾学院学报,2004,(5).
- [7]赫德逊.欧洲与中国[M].王遵仲译.中华书局,1995.
- [8]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M].商务印书馆,1962.
- [9]潘吉星.李约瑟文集[M].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
- [10]杨慧林.圣经新语:下编[M].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89.
- [11]乐峰.天主教与中国文化[J].山西大学学报,2006(5).
- [12]雷雨田.基督教与儒学之异同和共处之道[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3).

“利玛窦规矩”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

作者: [朱大锋](#)
作者单位: [黄淮学院](#)
刊名: [兰台世界](#) PKU
英文刊名: [LANTAI WORLD](#)
年, 卷(期): 2009, "" (7)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12条)

1. 邓恩, 余三乐, 石蓉. [从利玛窦到汤若望](#) 2003
2. 罗鱼泽. [利玛窦书信集](#) 1986
3. 潜存训. [近世译书与中国现代化](#) 1986
4. 谢和耐, 耿升. [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 2003
5. 罗大正. [传教士东来与西学传播](#)[期刊论文]-[齐鲁学刊](#) 2004(06)
6. 吴光会, 唐棣宣. [明清时期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学西渐”](#)[期刊论文]-[宜宾学院学报](#) 2004(05)
7. 赫德逊, 王遵仲. [欧洲与中国](#) 1995
8. 利奇温. [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 1962
9. 潘吉星. [李约瑟文集](#) 1986
10. 杨慧林. [圣经新语](#) 1989
11. 乐峰. [天主教与中国. 文化](#)[期刊论文]-[山西大学学报](#) 2006(05)
12. 雷雨田. [基督教与儒学之异同和共处之道](#)[期刊论文]-[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5(03)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ltsj200907031.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ecc6aa82-4dec-47e8-8855-9e4d00901786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